

脈流着純純的

中國文化血統

——紀念理和先生

朱學衡

理和先生的遺著我讀得不周全，理和先生的生平我亦知之不詳，然而却于他的人有親。從我所讀過的先生的遺著來說，不必去思索衡量，即感知生活竟是怎樣的肆虐着他——我不願替他承認那是命運對他的虐待；這因他不曾折腰于命運。我說于他有親，想即在此；但凡脈流着純純的中國文化血統者，無不有這種高遠強大的氣質，亦因如此方能相得而無間然。

但說到先生的不屈于命運，却也萬萬不是甚麼劍拔弩張的要與命運拚個你死我活，而是中國人所獨有的知命的智慧與德性——這知命自是不可以解作宿命的。

這就要說說理和先生的作品風格——那是唯他所獨有的，也即我民族所獨有的。說他有的是純純的中國文化血統，並非指他是那個時代臺籍作家中唯一不需攻克語文障礙的天之驕子——這是不相干的；試看中原發生的五四和普羅，其作家為數千萬，却大抵都文化血統不純了。先生恰是三十年代流居東北和華北，應受浸染而未受浸染，唯其如此，才更獨獨的

突出了理和先生的可珍貴，且更是我民族這個時期裏不多見的瑰寶。

先生的作品寧是較近于五四的清新，和普羅的寫實；間也採了日本的私小說模式。可也須知道，五四的唯一可取者，除此清新，便餘皆不足觀；而普羅也是除却以其特性之一的寫實，有助於五四的從概念化落實于生活化，此外也一無是處。理和先生便是得此兩者所長，擴其所短。而取此所長，猶如他的使用了日本的私小說模式，俱不足亂其純純的中國文化血統。

試以宿命和知命來作血統鑑定，即不難一現五四與普羅的原形。宿命之論本來自宗教迷信與社會階級，這兩者皆具一種命定而不可有悠遊迴轉餘地的共同的宿命特色。五四所謂的新文化運動，于民主和科學便是奉之為宗教迷信，它肯定了民主和科學的至高無上，肯定了民主和科學便是一切，說一不二，即使因之而否定中國歷史文化亦在所不惜。然而却無知于此兩者皆在地球一半的時空之下，其一僅為應對政治體制的暫時之計，一為尚在生長而在五四前夕便已被考古學狠狠修理了一通的嫩苗嫩枝。五四文化人是把相對性的客體，主觀的肯定為絕對性的一種排他的宗教迷信。普羅則除却排他的宗教迷信出動，直至如今仍然執迷不悟者外，更是自始至終永不會放棄社會階級。但我民族得天之獨厚，素無宗教迷信和社會階級，所以是知命；知天命；知宇宙法則的常與變之道——這便甚麼都好圓通豁達。四時運行是變，日月出沒是變，却千古以來以去，年年月月日日無不若是，此則又是常。而效法天地，取宇宙法則行于人世，乃中國亦有貴族與平民、地主佃農，主子與奴僕，此是變中之常（倫常）。惟貴族世襲三代後復歸平民，平民功在家國天下而得封爵；地主遺產諸子孫一再平分，三代而為自耕農，甚至兼為佃農；為主子者以產業自由制度，多不出三代而失其位，而為奴僕者其子女乃自由人，勤勞置產的機會平等，當代便可為主子。似此皆是師法天地，

一如人人可爲子女，亦一樣的可爲父母，此即是常中之變。明此即是明德，是知天命。說理和先生脈流着純純的中國文化血統，不是空泛的禮讚，却有這樣的懇切，其強大亦在於這樣的與天地同心。如此也才理和先生怎樣苦命，但無苦相，任生活無情的肆虐，他自是重重的體恤敬重，損傷不得他的喜氣，如此也才是理和先生的貴氣——文章而乏貴氣，寧是不要文章的好。只看那平妹山裏去盜林，取之于天地原就會那樣的理直氣壯的潑辣，然而知天理還是知國法，林警的追緝也就應該了，冤仇忌恨亦無由可生，僥倖的脫逃了就又是一番可慶喜。到得魯迅之流的手上，是要因其盡失民族自信，而至自虐狂的將這些惡解爲阿Q精神的。

命運在中國人心中是認它做造化小兒的頑皮，你也就好與之戲耍。看街鄰的娃娃一起玩，認真得一無虛假，爭放汽水瓶蓋，會一把辣辣的抓過去，驚得你個半死，那邊再狠狠一掌摑過來，你要吓得閉目不敢看了。那都認真得沒有輕重。可是娃娃家這也是玩，你一旁却不可以大人的觀念來認真。五四和普羅因皆非中國的，也就成了這種旁觀者的觀念認真，乃至不平的吃味起來，待你不識相的介入而打抱不平了，派起了誰是誰非，兩小兒眨眨眼的功夫却又撲撲抱抱好得掉了頭，玩起他再戲耍不盡的下一個章回。天理國法人情原是可以剪刀石頭布那麼的百玩不厭，我輸給你，你輸給他，他輸給我，誰都沒有灰心喪氣或得意忘形，知命原是如此的知得平等對待，討價還價也是一時翻了臉還那麼的玩得喜氣。這也並非中國人不被命運擊倒，而是命運好生的裕餘，不會以宗教迷信來說一不二，或以社會階級來注定你永世的成分是紅五類抑是黑五類。理和先生的意境在此，這不是今之西化了的文化人所能感知其強大高遠而貴氣的。而西化了的文化人這不純的文化血統，自是要與中國的人世有隔，與理和先生懇親不上的。

近年來鄉土文學之辯，我看多屬皮下之癢，那樣一把把的搔法是搔它不到的。若理和先

生這樣不偏不倚，純純的中國文化血統，甚宜拿來平息雙方誰也不得服誰的爭執。一般而論，以任何素材爲題材，皆應無可厚非，取鄉土素材亦應如是；便是甚麼富與貧、光明與黑暗、歌頌與暴露，俱當無所趨避——素材就是素材，市場百物雜陳，可取之任烹中餐西餐、大宴小酌、家常飲食，所以一切還都在于作者的人格人品。過去所見有關乎此的論調，其所以往往口齒不清，亦應是論者的人格人品之乏條理；然而即使這樣，也非不可藥救，其論據若得依于如理和先生這樣的作品，便彼一方既無由視之爲地方主義或普羅文學，此一方亦不至論調紛歧，衍義不明。而所謂紛歧與不明，其一是作者與論者皆圖造作些甚麼來引起注意，此是受西方的喜搞流派所影響，以至沒的新奇好搞時，就搞舊奇。對此，黃春明批評的好，說此輩作者對待讀者不過如對待觀光客，愈能找他們看到少見或未曾瞧過的世界（農村漁村鹽場工廠），愈可討彩。對此，致力于取寵觀光客的人來瘋，原也是一笑付之，其無內容，無意境，亦不必計較或非議了。但是其二，明明動機在于這種翻翻花樣以媚讀者，却要強加一些所謂的意義，這就不好；而正是惟其強加，先就不貼合，至于強加些甚麼，爭論便由是而紛紛的沓雜起來。

在于知識分子，今已俱被教育得鄙視感性與主見，而以唯理性唯客觀爲榮爲傲，凡百對待皆須外求一個價值標準，却不知感性即本性，主見並不就是主觀，而感性與理性更如人之雙足，失其一便只好假借外物來支撐。因是這樣，知識分子之看待勞苦大眾，便不免以概念的慈善家自居，一開頭即引用西洋的勞動觀將辛苦解作痛苦，這真是褲襠放屁——隔到兩岔兒去了。于是以都市生活爲準，來看鄉鎮生活，憤憤不平之餘，則視爲又一重痛苦。這樣子下去，自是沒完沒了的。然而僅此不平，終歸徒然，還是要提出問題，但却因爲有隔，問題也不是容易即可提得出來，也只能用米價低，農民收益差，人口流向都市云云。試想，

若欲以這樣粗淺的反映農村現實，便能解除農民痛苦？這只怕作者或論者自身也不好說。然則又當如何？于是捨前瞻式的予人以啓發，不得不回過頭去追究，結果不外是仇這恨那，于事無補。作家或論者，其責任本不在此，是要強出頭才弄得這樣子一無是處。若嫌米價低，你自己就是迫使米價低的罪人之一，人總貴乎反省而求諸己，你是很早就從一餐三碗飯減到了一碗，需求量減掉三分之二，供過于求，米價焉得不低！這要仇誰恨誰去？這問題的答案可以是大家再把日子過回頭去，恢復到只得蘿蔔乾下飯的水準，那樣的話，飯量自然大增，米價自然上揚；然而這答案也自然是最壞的，首先你便要受不了那種窮日子。為何你不放眼去看看，多少專家、技師、勞苦大眾都在同心合力，嘔心瀝血，辛苦備至的爲了生產你所需要的那兩碗代替主食所從事的農場、牧場、漁池、果園，便連調味品也都爲你生產得那麼周到，木耳、香菇、金針、枸杞種種一樣也沒慢待了你，遑論雞魚肉蛋！再說人口流動，農村流向都市者主要爲國中生，他們受到初中程度的教育便不再安于農村，對此，你的最壞的答案是否取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回復六年，或根本取消國民義務教育？如怪罪爲發展工業才把農村人口人力吸收了去，你的最壞的答案是否把全部工業毀棄了，來保護和保障農業？除却這些最壞的答案，你可曾感知大量缺乏人力的農業是一種世界性的大勢所趨，而農村必須邁向農場化、機械化？這趨勢是否並不壞？而農村之所以遲遲的猶豫觀望，你可感知得到焦點原因何在？沒有可抱怨可仇恨的對象，只是農民痛惜糧食作物，對于世界上最會浪費的國家所提供的美式農機尚不肯接受，農民不能忍受收割機蹂躪過的一甲田要糟蹋掉百斤以上的稻穀，也不能忍受甘蔗離地一尺高的莖子是糖分最高的精華所在，却被收割機撇下在田裏任其廢爛。中國人的感激天地，愛敬萬物的品格，對此着眼尚不只在遺穗和蔗根的物質數量與價值，而是視爲傷天理的作孽。惟今之知識分子心目中哪裏還有什麼玄虛可笑的天理在！所

以也沒有了感激愛敬之情，却于物質現實中異常的早熟。而在農民們觀望猶豫，等候中國自己研製出產使得他們滿意接受的農機前，這個過渡期的問題，也不是沒人管，沒人來解決，你又可曾感知問題的存在？並提出答案來？——即使是最壞的？你也許拒絕知道國家仍然控置着巨額資金以待農機貸款，或者視而不見國家調派部隊助民收割，因而也完全不知一個班的兵士一日間的收割，便可為農友減省六七千元的工資支付，亦即減低農產六七千元的成本而增其收益。如果對於所有這些農村種種全然無隔，却為何作出論出那般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那麼無志氣的叫苦連天，究其竟能够當得些什麼？這已不關乎富與貧、光明與黑暗、歌頌與暴露，而是虛偽了；且是外借的西洋觀念，來發中國牢騷。

而理和先生也是不關乎富與貧、光明與黑暗、歌頌與暴露，惟是他已在這些之上。世間最壞的常與最好的相似，就像說老如頑童。但相似並非相等，這因理和先生最配得是眞眞誠誠的鄉土文學家，足為我等後生楷模。尤有進者，他的著作取材于地方鄉土而不僅止于此，先生脈流着純純的中國文化血統，豐豐滿滿，無需外求，故而他所表達的世觀是中國的，表露的意境是中國的，此即所以凡鄉土文學必是民族文學之理，也因之才會寫至貧窮、黑暗、暴露，而一無五四或普羅的貧賤寒酸。五四和普羅不惟專事來作宿命論，更是先便設定了對象以便于怪罪，恨遍了天地人世，而獨我無辜，此是最沒有出息的了。理和先生自有他中國人獨特的感激，光照、體恤這種種高遠強大的貴氣，所以能不為五四和普羅所動，能有他自己獨立的人格人品，而玉樹臨風的呈現為一種民族品格的風範。

邇來理和先生的好友發起營建『理和紀念館』，此是我所不敢奢望者，而既這樣動議了，我自我盡心盡性以從之，因為也惟先生配享此紀念之祀，這也是整個文壇無前例的光彩！